

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安妮·埃尔诺的获奖演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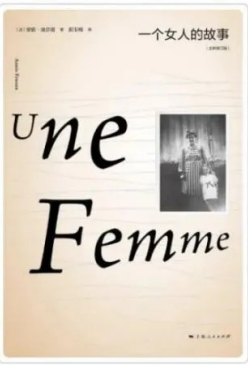
□[法]安妮·埃尔诺 吴岳添 译



安妮·埃尔诺



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代表作



从什么地方开始呢?这个问题,面对着空白的纸张,我已经给自己提过几十次了。似乎我需要找到唯一能使我进入写作、一下子消除所有疑虑的句子。一种钥匙。今天,对这件事情的惊愕——“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吗?”——已经过去,要面对我的想象力以不断增长的恐惧呈现在我面前的环境,我感到了同样的需要。在你们今晚邀请我来的这个位置上,找到能使我毫不颤抖地、自由而坚定地说话的句子。

这个句子,我无需到远方去寻找。它突然就出现了。非常清晰、激烈。简明扼要,无可置疑。它写在60年前我的内心日记上。我要为我的种族复仇而写作。它与兰波相呼应:“我永远属于劣等种族。”那时候我22岁。我在外省的一所学院里,和大多数出身于当地资产阶级的子女一起学习文学。处在无地的农民、工人和小商贩,因禁止、口音和没有文化而被轻视的人们这一系列的末尾,我骄傲而天真地以为写一些书,成为作家,就足以弥补与生俱来的社会的不公。在学校随着我学业的成功而使我抱有的幻觉里,一种个人的胜利在抹去几个世纪的统治和贫困。我个人的成就怎么能弥补我受过的任何屈辱和伤害呢?我没有向自己提过这个问题,是有一些理由的。

从我会读书开始,书籍就是我的伴侣,阅读自然是我在课外的消遣。这种兴趣是一个母亲培养出来的,她本人在她的店铺里接待顾客的间隙读了大量的小说,她更喜欢我读书而不是缝纫和编织。书籍的昂贵,它们在我的教会学校里受到的怀疑,使我对它们更加向往。《堂吉珂德》《格列佛游记》《简·爱》,格林和安徒生的童话,《大卫·科波菲尔》《飘》,后来的《悲惨世界》《愤怒的葡萄》《恶心》《局外人》;与其说是学校的规定,不如说是机缘巧合决定着我去读些什么书。

选择学习文学,就是选择留在文学之中。文学成了超越其他一切价值的价值,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它使我投身于福楼拜或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部小说里,并且充分地感受它们。这是一块我也不自觉地用来与我的社会环境相对抗的大陆。我也只把写作看成是改变现实的可能性。

并非是两个出版商拒绝了 my 第一部小说

说——这部小说的唯一优点是探索一种新的形式——打击了我的愿望和自尊,而是在一个按照性别的来角、禁止避孕和中止妊娠是一种罪行的社会里,作为一个女人与作为一个男人具有重大差别的生活环境。作为有两个孩子的已婚妇女,有一份教师的职业,负责管理家务,我日益远离写作和要为种族复仇的诺言。在卡夫卡的《审判》里读到“法律的寓言”,我不能不在其中看到我的命运的形象:死去时尚未跨过专为我设置的门,那本只有我能写作的书。

然而这是没有考虑到个人和历史的偶然性。父亲在我到他那里度假三天后死去,在学生都来自和我一样的民众阶层的教室里任教,一些世界性的抗议运动:那么多事件通过一些意想不到的敏感的渠道把我拉回到我出身的世界、我的“种族”,使我的写作有了一种隐秘而绝对的紧迫性。这一次不是致力于我20岁时虚幻的“随便写写”,而是投身于难以描述的一种被压抑的回忆,揭示我的亲人们的生存方式。为了理解使我远离我的来源的、自身的和外在的原因而写作。

对写作的任何一种选择都并非自然而然的。但是移民们不再说他们父母的语言,社会阶级的叛逆者们完全不再说同样的语言,而是以另外的词语来思考和表达,他们都面对着一切额外的障碍。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他们确实感到很难,甚至不可能用学到的主流语言来写作,他们学会了掌握了这种语言,在它的文学作品里欣赏一切与他们出身的世界有关的东西,这最初的世界是由描写日常生活、工作、占据的社会地位的感觉和词语组成的。一方面有他们学会用来命名事物的语言,用它的粗暴、它的一切沉默,例如在阿尔贝·加缪的非常优美的作品《在是与否之间》里,一位母亲和一个儿子之间辩论时的沉默。另一方面是被欣赏的、内心化的作品的典范,它们开辟了最初的世界,他们感到自己的提高要感谢它们,甚至往往把它们视为真正的家园。在我的家园里出现的有

福楼拜、普鲁斯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在重新写作的时候,他们对我没有任何帮助。我必须继续“好好写”、漂亮的语句,甚至就是我教给学生的句子,以便根除、展示和理解穿透我的伤痕。我本能地感受到一种伴随着愤怒和嘲弄、甚至粗俗的语言的喧哗,一种过分的、反抗的、往往被屈辱者和被伤害者使用的语言,犹如适应对蔑视、耻辱和对耻辱感到羞耻的回忆的唯一方式。

同样,我很快就觉得显然——以至于不可能考虑从另一个地方开始——要把我对社会创伤的叙述牢牢地置于我作为反叛的大学生经历过的环境之中,当时法兰西国家始终在谴责妇女求助于接生婆在私下里非法堕胎。我要描述发生在我的少女身体上的一切,发现乐趣,月经。就这样,在这部发表于1974年的第一部作品里,我当时尚未意识到,已经确定了我将要写作的领域,一个既是社会的又是女性的领域。从此我的种族复仇和为我的性别复仇就合二为一了。

在思考生活的时候,怎么能不同时思考写作呢?不考虑写作是否加强或妨碍了关于人和物的被认可的、内心化的表达方式?反叛的写作通过它的粗暴和嘲弄,不正是反映了我这个被统治者的态度吗?读者如果很有文化修养,他就会对书里的和现实生活里的人物保持同样突出和高傲的态度。因而在最初,我想要讲述父亲生平的时候,我觉得盯着他的目光是一种背叛,将会无法忍受,为了躲过这种目光,从第四本书开始,我采用了一种中性的、客观的写作,从它既不包含寓意、又没有感人迹象的意义上来说是“平淡无奇”的。粗暴不再被展现出来,而是来自事件本身而不是来自写作。迄今为止,无论写什么主题,找到同时包括

现实和现实提供的感觉的词语,已经逐渐成为我在写作时始终关注的问题。

我必须继续说“我”。第一人称——在大多数语言里,我们从会说话时起直到死去得以存在的人称——用在文学里一旦表示作者而并非一个虚构的“我”时就往往被视为自恋。应该想到在此之前“我”是在回忆录里讲述武功的贵族们的特权,在18世纪的法国是民主的征服,是对个人平等和成为他们的故事主题的权利的肯定,正如让-雅克·卢梭在《忏悔录》的第一段开场白里所要求得到的那样:“但愿大家不反对对我以下所说:我只是个平民,没有值得读者一听的事要我说……我的一生尽管默默无闻,但要是我的思想比国王们更丰富更深刻,那我的内心的全部活动就会比他们的更能吸引人。”

尽管如此……激励我的并非这种平民的自尊,而是使自己成为“我”——既是男性也是女性的形式——的愿望,作为一种探索的工具,它捕捉一切感觉,被记忆掩埋的感觉,周围世界时时处处不断给予我们的感觉。这种感觉的前提对于我同时成了我探索的真实性的向导和保证。但是有些什么样的目的呢?对我来说,问题不在于讲述我生平的经历,也不是摆脱它的秘密,而是了解一种真实的环境,一个事件,一种恋爱关系,从而揭露只有写作才能使之存在的某种东西,并且也许还能传递到其他人的意识和记忆里。谁能说爱情、痛苦、哀悼、羞耻不是普遍存在的呢?维克多·雨果写过:“我们无人有幸拥有一种属于他的生活。”但是所有的事情既然都不可避免地以个人的方式来感受——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那么只有书中的“我”以某种方式变得透明,而由男女读者的“我”来填补它的时候,它们才能以同样的方式被阅读。总之,但愿这个大写的我是可以转变人称的。

我就是这样理解我在写作中的倾向的。它不在于“为”一类读者写作,而是“从”我作为女人和“国内移民”的体验,从我此后对经历的年代的越来越漫长的记忆,从现在来不断提供他人的形象和话语。作为在写作中对我自己的保证,这种由信仰支撑的倾向变成了确信,一本书能有助于改变个人的生活,打破一切被忍受和隐藏的事情的沉默,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当难以言说的事情被

说出来的时候,这就是政治。

今天我们随着妇女的反抗看到了这一点,她们找到了动摇男性权力的词语,像在伊朗那样起来反对它的最古老的形式。我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写作,但我仍然在思考妇女们在文学领域里占据的地位。她们尚未获得创作作品的合法性。在世界上,包括在西方的知识界,一些男人对妇女们写的书视而不见,从不引用它们。瑞典学院对我作品的认可,是所有女作家的希望的信号。

在对那些不可言说的社会问题的揭露中,这种阶级和/或种族的、同样还有性别的统治关系的、只有那些作为被统治的对象的人才能感觉得到的内心化,有着个人的但也是集体的解放的可能性。在了解现实世界的同时抛弃它的由语言、全部语言承载的一切观念和价值,这就是在扰乱它的既定秩序,动摇它的等级制度。

但是我不会把这种使男女读者接受的文学写作的政治作用与我的一切事件、冲突和观念所必须采取的立场混为一谈。我成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代,那时当然有一些作家和知识分子采取了与法国政治相关的立场,并且投身于社会斗争。今天谁也不能说如果没有他们的讲话和介入,事情是否会有不同的转向。在当今的世界上,信息来源的多样性、图像取代的快速,习惯了一种冷漠的形式,使专注于自己的艺术成了一种诱惑。但与此同时在欧洲,一种退却和封闭的意识形态正在抬头。建立在排斥外国人和移民、在经济上抛弃弱者、监视妇女的身体的基础上,它迫使我接受一种高度警惕的责任,正如对所有认为人的价值到处都永远相同的人们一样。

授予我最高的文学荣誉,就是把我在孤独和疑虑中进行的写作和个人探索置于一盏明灯之下。它不会使我眼花缭乱。我没有把授予我诺贝尔文学奖看成是我个人的胜利。认为它在某种意义上是集体的胜利,这不是骄傲也不是谦虚。我与那些男人和女人分享自豪,他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希望所有的人有更多的自由、平等和尊严,无论他们是什么样的性别和类型、肤色和文化。那些男人和女人想着后代,想挽救被一小撮人对利润的欲望使全人类越来越难以生存的地球。

如果我回到20岁时所做的为我的种族复仇的诺言,我不会说是否已经实现了它。正是从这个诺言,从我的祖先,因使他们早天的劳作而痛苦的男人和女人,我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和愤怒,才有了要使这个诺言在文学中、在各种声音的合唱中占有一席之地之愿望和雄心,这种合唱很早就伴随着我,使我接触到其他的世界和思想,包括使我反对它和想改变它的思想,以便把我女性的和社会反叛者的声音铭刻在永远呈现为解放的地方:文学。

我所认识的严绍盪先生

□刘建辉

严绍盪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几个月了。回想起同其交往的岁月,先生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不时地会浮现在我的脑海。特别是当我看到书房里至今还保存着的先生的来信、讲稿等时,由字及人,更感到一个鲜活的身影,就在我的面前。

这些天,一直想写些文字,来悼念这位对我如师、如兄以至如父的存在。但几度下笔,终未能就。细想起来,一是在我的人生中,曾有几个时间段,可以说是与先生朝夕相处,记忆中的画面,犹如一个走马灯,使我不知何落笔。二是晚年的几次隔海通话,先生的声音,都还洪亮,直至临去世的一个月,才得知先生已患大病。对我来说,先生的离世,实在是太突然,太震惊了,以至于我至今仍无法接受这一突如其来的现实。

我与严先生最早相识于日本京都的日文研(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1994年4月,先生作为客座教授来到日文研,供职一年。其间,恰好我也在此进修,双方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很快就无所不谈了。当时,先生54岁,长我21年。由于先生的谦和以及我的不逊,我们的交往从未因年龄受阻,一起谈天说地,一起出游,一起访友。记得因日文研在京都西郊的半山腰,每天报纸送得较晚,我便在上班的路上购一份《朝日新闻》带到那里,两人边看报纸,边海阔天空地议论中日的“国家大事”,其乐融融。这件事,先生始终未忘,直至晚年,还经常提及,笑我为一个小报童。

1995年,在严先生的帮助下,我由南开大学外文系调到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做先生的副手。在此后的五年多时间里,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我始终都是在先生的关怀与照顾下度过的。我在比较所工作期间,一如在京都时一样,每周都同先生见上几面,在所里、在燕园咖啡厅、在彼此的住处。我们一起去上课,一起举办会议,一起接待外宾,一起出差……当然,也少不了一起长时间的“高谈阔论”。由于经常形影不离,以至中文系的王会计总是嘲笑我就像一个先生的“跟屁虫”。但就是与先生的这些频繁接触,使我就像一个“严门”弟子一样,从他那里学到了无论是学问上还是处理事务上的各种境界、知识与方法。受教于先生的这些,都足够我享用一生。可以说,在先生身边

的日子,是我一生最充实、最快乐,也是最幸福的一段时光。

离开比较所之后,我来到了现在的工作单位,即同严先生的相识之地——京都日文研。最初的几年,只要有先生的博士生答辩,他都会邀我参加。我也借此机会,前往北京看望先生。而每次见面,先生也从未把我当外人看待,一切都如以往一样,始终让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后来,由于所里工作繁忙,我回北京的次数逐渐减少,尽管利用召开国际会议的机会,邀请几次先生来访,但大都去匆匆,更多的是靠书信与电话联系了。

2008年,为纪念严先生出版其毕生巨著《日藏汉籍善本书录》,日文研专门召开了一次研讨会及庆祝会,会议邀请了多位日本中国学的前辈,如安藤彦太郎、户川芳郎、兴膳宏、小南一郎等,数十位中日友人无不高度评价先生的壮举,一起举杯为之庆贺。其间,先生在京小住数日,我们又得以尽情交谈。还有一次,2013年6月至8月,基于先生对中日文化交流所做的巨大贡献,日文研再次聘请先生访学,虽然只有短短的3个月,但让我又能近距离接触先生,共度了一段宝贵的时光。

严先生去世后,很多学友纷纷发文追悼,对其学问、人品等,均从各自的角度做了高度的概括和总结。每每读到这些文章,其中讲述的各种“故事”,无不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先生的认知和理解,亦愈发让我敬仰这位“共事”多年的先辈。下面,我也来讲述一下我从与其交往的点点滴滴中所认识的先生,以此让我们再一次深切地缅怀他一生走过的足迹。我所观察和认识的是:

严先生睿智。与先生交往中,感受最深的就是先生的聪明。日文研里,曾有一位提出日本海洋文明观的学者,当我们所有人都听得津津有味时,先生马上就嗅出了其中的危险,指出这是在切割历史,是为日本创立独立文明观点服务的。先生这种高屋建瓴、一针见血地看清对方或对象本质的智慧与敏锐,在其工作与生活中随处可见。只要读一下他为我们所作的书序便可知,篇篇都直指核心与要害,又能在更高的理论或实践层次上将其归纳、总结,并加以赞扬。

严先生勤奋。上世纪80年代,先生每天带上两个馒头一壶开水“泡”在北京图书馆里的故事,大家已有所知。在其60岁出头后,一到暑假,我去日本期间会将房间借给他工作,每次回来都得知,他是在没有空调的状态下,冒着近40度的酷暑,夜以继日地整理、抄写那部《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的卡片。听先生讲,他的第一部著作《李自成起义》(中华书局,1974年),也是于同样的条件下,在一个小圆凳上完成的。

严先生健谈。严先生爱讲话,很多人都会有同感。由于他丰富的经历和广博的学问,每次都会讲上一个下午或一个晚上,直到大家催他回家。从家史、北大史、“文革”史、中国史、日本史到他师长、同学、同事、国外友人等的个人趣事,可以说是无所不谈,无所不讲。就连平时自诩善谈的我,在他面前,也只能是一个默默的小听众。但看似聊天的这些讲话,都有很大含金量。在日文研时,先生经常会在茶余饭后给这里的中国学者和学生讲“故事”。一位已毕业了的同学后来说,他的很多有关中日两国的知识,特别是一些书本之外的知识都是听严先生讲话获得的。

严先生仗义。严先生在校内行政上,在国内、外学术界均身居高位。但谦和的他,面对“弱者”,总是会及时伸手相助。我见过无数人找他商量考研、求职等事宜,他都做了相应的安排或合理的建言。一次,一位报考先生博士的学生,因本人不在国内,无法办理相关手续,为了能够让其顺利地做先生,先生亲自几度往返于科研处与中文系。看此情形,还是王会计调侃道:“是你考学生的博士啊,还是学生考你的博士啊?”先生付之一笑,只是说:“她人不在,她人不在。”还有一次,我俩从国外出差回到北京,在机场过马路时,我差一点被疾驰的公交撞倒,先生挺身而出,冲着司机,用外人看来非常文明的“粗话”,大骂一通。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先生骂人,但心中着实被其勇敢和仗义所深深感动。

以上这些,都是我经历的先生工作和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或“细节”,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很多。即使只是这桩桩件件的“小事”,也足以让我们领略先生为人、为师的不朽风范。

■书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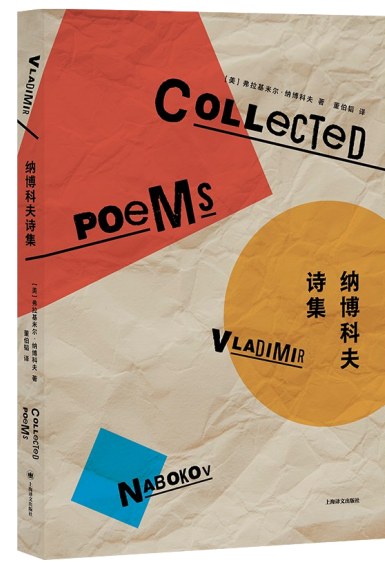
《纳博科夫诗集》出版

近期,《纳博科夫诗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纳博科夫诗集》收录了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近百首诗作,跨越了他59年的诗歌创作生涯,包括纳博科夫现存最早的作品《音乐》,容量堪比短篇小说的长诗《大学诗章》等。

像乔伊斯一样,纳博科夫首先是位诗人。他对写诗的痴迷始于15岁的夏天,接下来的十年里,他写下几千首诗。第一部小说《玛丽》于1926年发表,纳博科夫跻身伟大的现代主义者之列,他彻底革新了小说,令其蕴涵诗性。与此同时,他依然在写诗,虽然数量不如早期,但其趣味与个性足以弥补这一欠缺。这些诗与他的小说有同样的思想、主题,相得益彰。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是杰出的小说家、文体家,他独树一帜的写作风格为他在文学史上赢得盛名。纳博科夫的文学创作是从诗歌开始的,他不仅写作了大量俄文和英文诗作,还将抒情的冲动注入了小说。纳博科夫在开拓文采如诗的小说的同时也在尝试将故事带入诗中。

(世 闻)



世界文坛

SHIJI WENYUAN